

《法藏文庫》 碩博士學位論文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27

南宗禪學研究

論慧能禪的境界追求

壇經三旨探析

慧能禪經研究中的問題

維摩經不二法門與壇經

禪宗心性說與陽明良知論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印行

《法藏文庫》

碩博士學位論文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27

南宗禪學研究

論慧能禪的境界追求

壇經主旨探析

關於慧能壇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維摩經不二法門及其對壇經的影響

禪宗心性說與王陽明的良知主體論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印行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27 碩博士學位論文

監修 星雲大師

學術委員 樓宇烈 王堯 方立天 賴永海 陳兵 方廣錫

龔鵬程 藍吉富 慈惠 慧開 依空

總策劃 程恭讓

總編輯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編輯 永明 永進 永本 滿果 滿耕

二〇〇一年四月初版一刷

發行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發行人 慈惠（張優理）

出版者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轉一一九

流通處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〇二）二九八〇〇二六〇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隆路三二七號九樓（〇二）二七四八三三〇二

工本費 每册美金十五元

法律顧問 舒建中、毛英富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佛學碩、博士論文第三輯(十冊)目錄,總目錄刊在第三十冊之後

②1 三論宗佛學思想研究(李勇)

吉藏二諦思想研究(紀華偉)

《金剛經》般若思想初探(李利安)

龍樹的空觀與商羯羅的吠檀多不二論(康紹邦)

宗喀巴及其《中論》廣釋(許得存)

否定性的直覺思維(華方田)

②2 晉唐彌陀淨土信仰研究(劉長東)

彌勒信仰述評(張文良)

②3 慧遠的佛學思想及其歷史地位(業露華)

慧遠與羅什關於法身諸問題的討論(張志強)

善導的淨土思想(王公偉)

善導大師的懺悔思想及禮讚儀(聖凱)

智顛的淨土思想(張廷仕)

《淨土十要》思想研究(何松)

印光大師的佛學思想研究(性源)

②4 傅大士研究(張勇)

②5 黃檗禪學思想研究(劉澤亮)

馬祖道一與洪州宗評傳(何雲)

②6 禪宗與心學(陳利權)

鳩摩羅什禪學思想述評(劉元琪)

黃檗禪學思想述論(道本)

臨濟義玄哲學思想述評(呂有祥)

唐劍南保唐禪派及其禪法思想(黃燕生)

論神會的人生哲學(袁家耀)

宗密會通思想對普照定慧結社之影響(德相)

②7 南宗禪學研究(邢東風)

論慧能禪的境界追求(馮煥珍)

《壇經》主旨探析(伍先林)

關於慧能《壇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黃德遠)

《維摩詰經》不二法門思想及其對《壇經》思想的影響(靜岩)

禪宗心性說與王陽明的良知主體論(李霞)

②8 禪宗與羅教(徐小躍)

禪宗倫理學初探(溫金玉)

中國佛教倫理研究(王月清)

②9 憨山大師佛學思想研究(夏清瑕)

憨山思想研究(崔森)

元曉佛學思想研究(金勳)

契嵩及其佛學思想(王予文)

一行及其佛學思想(呂建福)

③0 唯識思想及其發展(徐紹強)

「真唯識量」探討(羅炤)

論佛教唯識學認識論中的主體意識(王健)

《宗鏡錄》的法相唯識思想(施東穎)

玄奘唯識思想之研究(黎耀祖)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序

星雲

從印度佛教東傳以後，二千年來，經過譯經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之孕育，到達隋唐宗派的建立，佛教思想在中國熱烈的展開，成爲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的時代。後來又有歷代高僧大德、學士文人，他們爲佛教撰述許多著作、註釋、論議，讓佛教的義理急遽發揚。

到了晚清，直至今日，在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學術之中，既有古今學術的辨論，又有東西文化的爭議；其詭譎怪異，錯綜複雜的過程，讓有心的人士備感中國文化需要轉型和重組。加之這一百年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倫理的基礎，面臨全面的衝擊，甚至破壞，急需有傳承、代替的精神和內容。

如果說，中國文化由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和佛教隋唐諸宗的思想之開展，奠定了中國文化基本的色調，那麼吾人也深信，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文化繽紛雜陳，也將會奠定以後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中國思想文化的基礎。因此，二十世紀的思想無論利弊、新舊，種種的紛雜激盪，對未來的影響可說無比的深廣！

佛教信仰的存在，不可能超越於時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經濟、學術之外。雖然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曾遭遇到全面的生存危機，所幸由於一大批高僧大德、檀那信眾，以及社會人士的關心、支持和努力，還有許多以學術著論的學者、教授，正反不同的議論，形成佛教在中國文化裏面存在的價值；這不但帶動中國佛教走出生存的困境，而且廿一世紀的來臨，「人間佛教」的建立已經激發出佛教新的動力，繼續發揮其利濟人天、淨化世界的莊嚴

事業。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裏，有改革派與守舊派之爭，也有僧侶佛教與居士佛教之論，甚至有大小乘、南北傳，和漢藏傳承的爭議。不管那些由於地理、氣候、文化、習慣之不同所形成的各地區佛教，歧異紛陳；但經歷「人間佛教」的提倡，在歷經思想與實踐之後的磨練，可以說已經逐漸成熟和定型，「人間佛教」必然成為當代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

隨著二十世紀佛教思想分裂的情況即將成為過去，在這世紀交替之時，佛光山繼續過去三十餘年來，在舉辦學術會議、編纂學術專刊、重編大藏經等既有的努力和成績上，我們又在廿一世紀來臨的此刻，成立「法藏文庫」，計劃分成數個階段，以三至五年為期，將近百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及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之佛教文獻，有計劃且有系統的加以整理，編輯出版，以迎接廿一世紀「人間佛教」的需要，自是意義深遠。

在整個《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出版計劃中，第一步是將中國大陸學界的佛學碩、博士論文，予以蒐集、整理和出版；繼之而台灣，而世界各地漢文論典的編纂，這便是《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編撰緣起。

現在，茲將我們的編撰旨趣說明如下：

第一、中國佛學碩、博士學位的培養工作，在大陸和台灣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開始起步，歷二十餘年的發展，經過老、中、青數代學者持之不懈的努力，如今這一領域由於中國大陸新人輩出，佳作不斷，成果輝煌。大陸二十年來的佛學碩、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涵蓋了佛教經典研究、佛教思想史、佛教文獻學、佛教制度與教史，以及敦煌藝術學、藏傳佛教，甚至近代中國佛教及世界漢文佛教研究等眾多的領域；並且採取了哲學、史

學、文獻學、語言學、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等多種研究方法。佛光山多年來也始終秉持「以文化弘揚佛法」，提倡和鼓勵教界重視學者的研究；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學界二十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視野開闊，主題多元，個性鮮明，成績斐然，內心至感欽佩！

第二、學術研究雖然是學者個人的事情，但學者的人生觀念不可能完全脫離於一般的社會、思想、文化和環境，學者們所關心的課題，他們提出問題及解答問題的方式，往往受到一定的學術文化傳統及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與制約。由此而論，海峽兩岸的佛教學術研究，就當然會表現出各自的個性與特點，其相互之間，因而也就有彼此交流、溝通及互補的必要性。據我所知，台灣學界一些學者非常注意收集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因為他們覺得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反映了大陸佛教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值得台灣學者們借鏡與參考。然而由於個人的連絡及資訊畢竟有限，他們也就很難窺見大陸佛學碩、博士論文的全貌。現在，《法藏文庫》努力將大陸佛學碩、博士論文予以系統的蒐集、出版，目的就是提供台灣學者更容易瞭解大陸的佛學研究動態，為兩岸佛教學術更進一步的交流，提供一些方便和機會！

第三、台灣自六十年代左右開始，在各個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興起了研究佛學的熱潮。當時由於師資難求，深感佛法之寶貴；自詹煜齋先生提供大專佛學論文獎學金之後，佛學著作就紛紛發表。近年來，各大學也准許設立宗教學院、佛學系等，並由於研究科學的人參與研究佛學者眾多，如圓覺文教基金會長期從事「佛學與科學」的座談會，邀請中央研究院梁乃崇教授、台灣大學教務長李嗣沆教授、東吳大學陳昌祈教授等發表論文；十餘年來，台灣學界所發表的論文，為數可觀。因此，本論典將在中國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發表到

一個階段後，接著繼續發表台灣的佛學碩、博士論文；而後將把海峽兩岸的學者、教授、專家之創作，以「中國佛教文化論叢」的計劃，結集出版，供給學者研究，以光大佛法。

第四、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創建之後，於一九七六年即編印、發行《佛光學報》；之後又每年舉辦學術會議，出版《佛教學術年刊》，自一九七六年到現在，從未間斷。

佛光山除了編撰學報專刊以外，一向也以文藝化、大眾化的雜誌論文，化導世間，以期發揚佛學之幽光，弘通佛教之奧義。現在在佛光山所創立的大學，如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西來大學，乃至佛光山叢林學院，均鼓勵師生撰寫佛學論文；《普門學報》也因此於西元二千零一年元月誕生了。

今後，《中國佛教學術論典》暨《中國佛教文化論叢》，將和《普門學報》配合編撰、發行，以提昇佛教的義學，培養高級佛學人才，此乃吾等佛子不容推卸的職責所在矣！是為序。

星五 二千零一年元月 于佛光山法堂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凡例

- 一、本論典將出版中國海峽兩岸暨世界各地華文碩、博士論文專集一百冊，自西元二千零一年元月起印行，為期三至五年內完成。
- 二、本論典每冊收集碩、博士論文一篇或數篇，每冊約三十萬字左右，一律布面精裝。
- 三、本論典除刊登作者的相片、姓名以外，對於指導老師及答辯的時間，都有詳明列出。
- 四、本論典為非賣品，旨在提供學術界研究參考之用。需要者酌收工本費，每冊美金十五元。
- 五、本論典所刊論文，均已獲得作者同意授權出版，除作者本人外，請勿轉載或翻印出版。
- 六、本論典內容不代表出版單位的思想和觀點。
- 七、本論典刊行後，將繼續編輯《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以供廿一世紀研究佛教學術者之參考。
- 八、歡迎海內外學者提供著作，酌奉稿酬。
- 九、本論典為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行，所有出版經費，悉數由佛光山宗務委員會提供。
- 十、聯絡處：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地址：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07) 6561921 轉 1119

E-mail: fgsastw7u@mail.fgs.org.tw



邢東風，一九五九年生，北京人。一九八二年於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一九八五年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同年留校任教。一九九〇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曾先後發表《略說中國佛教南北禪宗的異同》、《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和出路》等學術論文十餘篇及與他人合寫的著作、譯作多種。

南宗禪學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作者：邢東風

指導教授：石峻

答辯通過時間：一九九〇年

目錄

總序	1
凡例	1
南宗禪學研究	1
邢東風	1
前言	1
第一章 南宗禪的思想和實踐背景	7
第二章 惠能禪學基本思想：心性觀	37
第三章 惠能禪學的基本思想：修行方法論	69
第四章 惠能以後的南宗禪	99
第五章 禪宗的思想淵源	141
第六章 禪宗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	167
結語	199
主要參考書目	201

論慧能禪的境界追求.....馮煥珍.....207

《壇經》主旨探析.....伍先林.....291

關於慧能《壇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黃德遠.....331

《維摩詰經》不二法門思想及其對《壇經》思想的影響.....靜岩.....361

引論.....361

第一編 《維摩詰經》之不二法門思想.....367

第一章 《維摩詰經》的產生與流傳.....367

第二章 心淨思想.....371

第三章 不二法門思想.....377

第四章 經文結構、漢譯與闡釋.....385

第二編 《維摩詰經》不二法門思想對《壇經》思想的影響.....397

第一章 從《壇經》思想形成之背景看《壇經》與《維摩詰經》的相關性.....397

第二章 《維摩詰經》不二法門思想對《壇經》思想的影響.....405

結論.....437

禪宗心性說與王陽明的良知主體論.....李霞.....441

前言

佛教發源於印度，西元一世紀前後傳入中國，經過長期的傳播發展而成爲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禪宗是中國佛教的典型代表，惠能開創的南宗又是禪宗的一個主要派別。南宗禪在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研究禪宗的思想和實踐，不僅可以弄清禪宗的思想內容和實踐形式，而且有助於了解中國佛教、中國哲學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般特點和發展規律。因此，研究禪宗的思想與實踐對於科學地了解和繼承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遺產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禪宗研究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

禪宗在歷史上把本來是外來文化的佛教成功地改造成適應中國社會條件和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中國化佛教，它是把外來思想文化與中國社會的具體條件相結合的典型範例，因此，通過對禪宗的研究，可以爲我們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來文化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

另外，由於禪宗在當今已經成爲一種具有世界影響的宗教現象，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普遍從包括禪宗在內的東方古老文化中吸取思想營養，不少西方學者出於對工業文明的厭膩和超越理性主義局限性的要求，極力宣揚和讚美禪宗的非理性主義。這股思潮伴隨著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文明成果的過程也一併介紹到中國，於是封建迷信思想和一些唯利是圖的投機書商也借此契機大肆宣傳販賣禪宗的神秘主義。所有這些都給人們，特別是青年在現代化建設中的文化選擇與價值定向帶來種種困惑，這種情況需要我們在現代化建設中

對包括禪宗在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進行嚴肅認真深入具體的科學研究，因此禪宗研究又是現代化建設，特別是思想文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課題。

總之，禪宗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禪宗研究包含有許多方面的課題，其中主要有三個方面，即禪宗的歷史、禪宗的文獻資料、禪宗的思想和實踐。中外學者在這些研究領域作出了許多有益的貢獻，但也留下了不少需要繼續深入研究，或者懸而未決的問題。本書所探討的主要是禪宗的思想和實踐方面的問題。

關於禪宗的思想和實踐，中外學者已經作了大量的研究，並且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以往的禪宗思想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爲兩類，即佛教信仰主義的研究和非信仰的研究。信仰主義的研究主要是從佛教的觀念立場出發，試圖通過闡釋研究禪宗的思想來宣傳、維護佛教的宗教信仰，如有的學者通過考察大量的思想史料，辨析禪宗思想的源流，以說明禪宗的思想符合佛教的信仰，中國台灣印順法師的研究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型。有的則結合現代觀念闡發禪宗的思想，以證明禪宗思想的優越妙勝，日本佛教學者鈴木大拙（一八七〇—一九六六）的研究則是這類研究的代表。非信仰的研究大多力求對禪宗的思想和實踐作出科學的解釋，其中主要包括資產階級歷史科學的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前者主要是運用現象描述和歷史考證的方法解釋禪宗這一思想文化現象的歷史事實，不能揭示思想史背後更本質的內容，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長期從事的禪宗史研究可算是這方面的典型。後者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分析禪宗思想的哲學性質，並努力揭示作爲觀念形態的禪宗思想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之間的內在聯繫，中國大陸的哲學史工作者和佛敎史研究者在這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信仰主義的研究和非信仰的研究各有自己的長處，也各有自己的局限。就信仰主義的研究而言，它們大多以佛教的觀念和研究者的宗教經驗為基礎，因而對禪宗思想的理解和對禪宗所解決的問題的把握更易於遵守原義。而且由於它們大多不能超出佛教慣用的名相術語的限制，不能用科學規範的語言說明禪宗的問題，致使他們的研究成果難以為一般讀者所理解。非信仰的研究不受佛教信仰的限制，能夠比較客觀地觀察問題，得出更為接近實際的結論；但是由於缺乏宗教經驗的根據，容易忽略禪宗思想的實踐性而把它單純地作為一種抽象的理論或學說，因而往往在對禪宗的思想及其問題的理解和把握上出現有失簡單、片面和曲解的情況，甚至由於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嚴重地妨礙了深入具體的科學研究。

本書研究禪宗的思想和實踐，目的不是為佛教的宗教信仰作論證，而是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當代哲學、宗教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多方面學術研究的成果，對禪宗的思想和實踐作出科學的分析說明。筆者試圖恰當地汲取鑒信仰主義和非信仰的兩方面研究成果，既不落入宗教信仰的窠臼，又要充分尊重信仰主義的研究成果，在盡可能準確地把握禪宗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基礎上，沿著前輩學者開闢的道路，對禪宗的思想和實踐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筆者認為，研究禪宗的思想和實踐，應當從實際出發，充分注意禪宗思想的實踐性，而不應從一般的哲學模式出發，把它只當作一種無關乎宗教修行實踐的純粹理論學說或知識形態，這是準確地把握禪宗思想及其所要解決的問題的關鍵。禪宗和以往的佛教一樣，本質上仍是一種解脫道，它爲了求得人生解脫而提出自己的一套思想主張和實踐方法。如何修成成佛、覺悟解脫的宗教實踐問題就是禪宗的思想和實踐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禪宗爲了說明修行成佛自在解脫的根據而極力張揚宗教實踐主體的地位，他們強調修行實踐的主體性原則，

並且提出和運用靈活不拘、無規可循的修行實踐手段。這樣的思想主張與實踐形式，在隋唐時代的佛教中有其正反兩方面的前提基礎，禪宗的思想和實踐代表了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趨勢，是對傳統佛教的革新，它作為革新的佛教更全面地適應了中國社會現實條件對佛教的要求，也更成功地融合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成分，因此說它是典型的中國化佛教。禪宗的思想和實踐形成之後，又反過來從文化深層結構方面給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以廣泛深遠的影響。這就是本書所要說明的基本觀點。

對於禪宗的思想和實踐，應當而且完全可以作出科學的說明。某些無神論者由於不承認佛教禪宗的理想目標具有任何真實性，於是簡單地把禪宗的思想主張一概視爲宗教迷信的「囈語」而加以全盤否定，這是一種愚蠢幼稚的做法。而有些佛教信仰者則根本否認用科學方法研究禪宗的可能性，如鈴木大拙就明確主張禪完全超乎人類「邏輯理解」或「智性理解」的範圍^①，沒有禪的宗教體驗或內在理解便無權對禪作出邏輯說明，「在對禪作出批評性的解說之前，必須對這種不能作邏輯說明的內在的意識狀態有所體驗」^②，甚至非難和嘲諷胡適用資產階級歷史科學的方法對禪宗的思想和歷史所作的說明，認爲胡適的研究根本不能觸及禪的內在方面^③。

筆者認爲，胡適對禪宗思想的理解和說明固然有不甚精確之處，而鈴木大拙的態度則更表現出一位信仰者的狹隘與片面。事實上，對於禪宗追求的理想目標及其所設想的最高實體，信仰者與非信仰者之間可以適當保持各自看法：信仰者信其爲真，可以憑自己的內心去「印證」；無神論者認其爲假，也可以用自己的理論去說明。但我們認爲思想史研究的重點不是去解決宗教信仰的理想目標是否真實的問題，而是弄清宗教信仰者們爲追求自己所信仰的理想所付出的實踐努力及其所提出的實踐主張究竟如何與是否合理。本書所研究的對象就

是禪宗師徒爲了求得人生解脫而提出的思想觀點和他們所採取的具體實踐形式。我們完全可以以把他們的思想主張和具體實踐當作歷史事實來對待，尋找其形成的背景與前提，總結其思想內容和實踐形式，以及它們的發展脈絡、規律特點，分辨其正誤得失，探討它與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關係、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關係，以及它對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發生影響作用的機制等等。

①參見（日）鈴木大拙《禪學隨筆》，第一四八—一九一頁，台灣志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②見（日）鈴木大拙《禪學入門》，第四六頁，三聯書店一九八八年版。

③參見（日）鈴木大拙《禪學隨筆》，第一四八—一九一頁。當然，胡適對於鈴木大拙有關禪的「內在方面」所作的研究也不以為然。有一次梁實秋對胡適談起鈴木大拙的幾本禪學著作，胡適說：「你不可信他，那都是騙人的。」參見《胡適先生二三事》，《梁實秋散文》第三冊，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三二六頁。